

制度惯性下的有限信息博弈： 朱熹报刊使用中的政治策略及历史局限

魏海岩

摘要:南宋道学党领袖朱熹在政治博弈中十分重视邸报与小报传递的信息,并策略性使用这些信息以实现提高道学声望、确定政治同道、攻击政敌、规避风险等目的。在此过程中,朱熹虽深谙官私报刊传播中存在新闻供给不足、小报的非法性阻滞政治反馈、小报误传导致政治焦虑等问题,却因受限于当时的制度框架和本人的政治立场,未能推动报刊制度的改良。朱熹的阅报实践及体验表明,在专制体制与政治倾向的双重桎梏下,单纯的政治博弈无法成为促进古代新闻传播进步的动力。

关键词:朱熹;邸报;小报;宋朝;政治博弈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3-012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XW109)

进入政治领域的信息是一种资源、工具性的存在,在政治博弈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纵观中国古代社会,讥评时政、制造流言、恶意诽谤、播散谣谚、张榜讨伐等足以调动舆论的信息传播就成为政治博弈中常见的、特别被倚重的手段。宋代是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中央政府统一发行的邸报、民间经营的小报皆在此时出现并快速成长,二者甚至在活跃度、灵活性等方面为后世王朝所不及。另外,宋代君主唯恐权臣侵夺皇权,有意在朝廷中同时任用两个对立的党派,施展“异论相搅”的御下之术,^[1]为朋党政治的形成提供了权力结构基础。当时的士大夫又受儒家文化浸润,往往在权力和利益之争走向极端的情况下,适时发挥缓冲、甚至保护作用,使得落败一方,不仅能全其首领,还保留一定言论自由,^{[2]385-386}大异于其他朝代。新闻与政治传播、舆论宣传有着天然联系,加之前述政治文化的原因,使得宋代邸报、小报不可避免地与小党^①、皇帝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博弈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别样特色:“朋党”围绕国事的辩论、党人相互倾轧等为邸报常见内容^[3],能够最直观地反映出党派斗争所造成的中央权力结构变化,士大夫们于此特别留意^{[4]4}。得势一方便严密控制邸报,试图通过对新闻的选择性披露,激劝士大夫紧跟自己,调整立场,^[5]有的甚至发行专门刊载官员任免新闻的月报^[6]。为防止与己方利益相悖的新闻流出,掌权朋党频出报禁,对小报进行压制。^[7]相反,小报的内容与发行不顾朝廷法禁,在野派士大夫化小报为斗争工具,“刊载反对当权派的时事政治材料和对当权派不利的消息”^[8]。

但是,已有的关于宋代朋党与报刊关系的研究多从宏观、中观层面展开,偏重于抽象与概括,对直接卷入政治博弈旋涡中的党人阅报行为却鲜少注意。

南宋时期道学兴盛,党徒遍布四方,成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朋党。然而,其政治权力攫取之路并不顺利,即使在全盛期的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大部分时期都没有推出道学党人在朝执政。朱熹虽

^①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政治博弈往往与道德问题捆绑在一起。在宋朝以前,人们普遍信奉“君子不党”,因此“朋党”一词就带有负面含义。宋朝的王禹偁、欧阳修等人却提出“君子有党”论,宣扬君子结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前代的朋党理论有很大冲击。本文中提到的“朋党”,只是当做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词义不寓褒贬。

为道学党领袖,但官位不高且长期远离朝堂,不得不以邸报、小报作为政治信息的接收媒介。鉴于已有研究的状况并结合道学党及朱熹本人的特点,本研究选择朱熹阅报活动为剖析对象,拟解决以下问题:朱熹如何利用邸报、小报提供的信息参与政治博弈;朱熹阅报体验能否促其生成改变既有报刊管理体制的思想,并通过政治派系的力量付诸实践,从而对宋代报刊生存环境产生有利影响。

一、兼阅官私报刊

宋代统治者大力推行以文治国,在社会上不断掀起崇儒兴学运动,造就了一个儒家学术繁盛的时代。由于学者们对经典都有自己的理解,因此观点相近者慢慢聚集而形成流派。其中,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以继承“道统”自居,故其主张的学说被称为“道学”。南宋绍兴初,秦桧与吕颐浩争斗期间,道学之士作为一支政治力量逐渐在政坛中崛起。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朋党欲扩张势力、实现政治理想必须取得皇帝的信任。^[9]如表1所示,孝宗受禅伊始,求治太急,为行事方便,不断提拔与重用曾觌、龙大渊等希旨的潜邸旧臣,使其形成强大的近幸之党。皇帝假近幸行专断与道学倡导的“公议”相悖,导致道学党持续掀起驱逐近幸小人的运动。可是,道学党既无皇帝支持,又无同道或同调居朝为相,因此一直处于下风。淳熙八年(1181)王淮任相。为树立唯才是举、无党无私的形象,他广泛启用道学之士,道学党政治上的成功似乎触手可及。可是,随着双方接触的深入,王淮的执政风格、政治目标与道学党圆凿方枘,二者终于走向公开决裂。旧患未去,新敌又生,加剧了道学党处境的恶化。淳熙十四年(1187),出于对王淮务求安静的政治取向不满和对其长期独相的猜忌,孝宗起用具有革新倾向的周必大,与王淮并相。为了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周必大开始大量推荐道学之士入朝。淳熙十五年(1188),守旧因循的太上皇高宗去世,失去靠山的王淮立即被罢。翌年初,孝宗禅位于光宗。正当道学党欲借新帝登基,一展政治抱负之时。左相周必大与右相留正爆发权力争夺。留正有光宗的支持又得王淮余党的帮助,使周必大被罢离京。这次博弈更多的是由孝宗、光宗之间矛盾引发,道学党与留正之间本无芥蒂,因此道学党人旋又成为留党,继续对抗近习之徒。绍熙五年(1194)八月,留正因在废黜光宗拥立宁宗一事上表现怯懦、难当大任而被罢,朝政由右相赵汝愚与枢密都承旨韩侂胄控制。两人因权力分割产生矛盾,便各树朋党,相互攻伐。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落败罢相。道学党因在赵、韩之争中支持前者,所以此后倍受韩党打压,以至于朝廷颁“伪学逆党籍”,掀起查禁道学、迫害道学之士的庆元党禁。

朱熹(1130—1200),绍兴二十三年(1153)开始正式步入仕途,但有实际差遣的时间非常短暂,且主要集中于淳熙、绍熙时期,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担任祠官(此类官员无衙署)。他仕途不显,于地方曾官至南路安抚使,于中央曾为侍讲。然而,朱熹自幼学习二程理学,随着其学术体系成熟和影响扩大,尤其随着淳熙七年(1180)、淳熙八年(1181)张栻、吕祖谦先后去世,成为道学党公认的领袖。他交际广泛,上自宰执下至普通士人皆与之有密切联系,其思想主张和行动具有影响政坛的力量。因此,自淳熙至庆元,道学党参与的政治博弈,朱熹都是重要的枢纽人物。^{[2]336}

表1 淳熙、绍熙、庆元年间道学党敌友统计表

亲道学党	初为敌党后为盟友	反道学党
周党:周必大进位宰相后以其为核心形成的朋党,至周罢相后星散。	留党:留正进位宰相后以其为核心形成的朋党,驱逐周必大期间为道学党之敌,后为盟友,至留罢相后瓦解。	近幸党:孝宗朝曾觌、龙大渊等,光宗即位后姜特立、谯熙载等,宁宗朝的韩侂胄等。
赵党:赵汝愚进位宰相后以其为核心形成的朋党,至赵罢相后解散。		王党:以宰相王淮为核心形成的朋党,主要活动于淳熙至绍熙时期。

资料来源:《朱熹的历史世界》^{[2]330-350,536-537}。

步入仕途以后,朱熹一直是邸报的忠实读者。如表2所示,淳熙到庆元时期,在有实际差遣期间,逢“邸报迟缓”之日,他便无法忍受,发出“殊无异闻”^{[10]第25册4859}的抱怨。在担任祠官、落职罢祠乃至致仕家居阶段,邸报获取虽有不便,朱熹还是努力克服困难,设法满足自己的阅报需求。

表2 淳熙、绍熙、庆元年间,朱熹阅读邸报统计表

序号	时间	阅报	任职情况
1	淳熙七年	《乞增修礼书状》:今覩进奏官报…… ^{[11]第21册930}	知南康军
2	淳熙七年	《缴进奏疏状》:右臣伏覩进奏院报…… ^{[12]第20册588}	知南康军
3	淳熙八年	《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承进奏官传到报状云云 ^{[13]第21册949}	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4	淳熙十四年	《君臣服议》:得邸吏所报朝廷冠服制度…… ^{[14]第23册3349}	祠官
5	淳熙十五年	《答黄直卿》:比读邸报,不胜恐惧。 ^{[15]第25册4649}	祠官
6	淳熙十六年	《答王子合》:不知后来颇见邸报否? ^{[16]第22册2260}	祠官
7	淳熙十六年	《刘智夫》:日间邸报迟缓,近亦殊无异闻。 ^{[10]第25册4859}	知漳州
8	绍熙二年	《刘德修》:继读邸状…… ^{[17]第25册4845}	祠官
9	绍熙四年	《答黄直卿》:邸报中见外间事赖诸贤维持…… ^{[15]第25册4647}	祠官
10	绍熙五年	《与临江王倅书》:见邸报台谏集议素服事…… ^{[18]第21册1270}	知潭州
11	绍熙五年	《答黄商伯》:但后来报状中有…… ^{[19]第22册2126}	知潭州
12	庆元元年	《乞追还待制职名并自劾不合妄议永阜殯陵事奏状五》: 今者伏覩进奏院报…… ^{[20]第21册1062}	祠官
13	庆元三年	《与黄知府》:垂示报状…… ^{[21]第25册4783}	祠官
14	庆元三年	《刘智夫》:罢书已至,绝不见邸报…… ^{[10]第25册4867}	落职罢祠
15	庆元三年	《刘德修》:间读邸报…… ^{[17]第25册4852}	落职罢祠
16	约庆元中	《与饶廷老》:示及报状…… ^{[22]第25册4758}	落职罢祠
17	庆元五年	《与宰执劄子》:寻覩邸报…… ^{[23]第21册1068}	落职罢祠
18	庆元五年	《答折子明》:每读邸报…… ^{[24]第23册2885}	不详
19	庆元五年	《答刘季章》:比阅邸状…… ^{[25]第22册2494}	致仕
20	庆元五年	《答刘德修》:忽阅邸报…… ^{[26]第25册4761}	致仕
21	庆元五年	《答刘晦伯》:然阅邸报…… ^{[27]第25册4728}	致仕

在日常人际交往过程中,朱熹也有机会从别人那里间接接收邸报新闻。如表3所示,现存吕祖谦等故交寄给他的书信中明确提到邸报新闻的就有7封。信中涉及的邸报新闻,大多充当写信的由头和谈论的话题。

表3 淳熙、绍熙、庆元年间,朱熹与故旧间书信往来提及邸报统计表

序号	发信时间	发信人	书信撮要
1	淳熙三年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报状中见辞免文字…… ^{[28]第261册93}
2	淳熙四年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近事邸报中当得之。 ^{[29]第261册96}
3	淳熙七年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但报状中犹未见得请何耶? ^{[30]第261册113}

续表

序号	发信时间	发信人	书信撮要
4	淳熙八年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前日见邸报,江西之命闻尚有两政阙。 ^{[31]第261册115}
5	淳熙十五年	陆九渊	《与朱元晦书》:比阅邸报,窃知召命不容辞免,莫须更一出否? ^{[32]第271册244}
6	绍熙五年	王炎	《与朱侍讲晦翁论谅暗中开讲事》:炎今读邸报,伏见八月八日指挥,增置侍读官…… ^{[33]第270册99}
7	庆元三年	杨万里	《答朱侍讲》:近见邸报,果若所虑,此酝酿久矣。 ^{[34]第238册5}

除邸报外,小报也频繁地出现在朱熹的生活中。如表4所示,从淳熙七年(1180)至庆元三年(1197),史料中皆有朱熹接触小报的记载。明确指出小报来自亲朋故旧的1条。其余未点明来源者,从行文的语气再结合宋代小报的商品特性推论,最大可能是朱熹自购。朱熹不仅在便于邸报接收的情况下有小报接触的行为,即便在有免费官报供应的知南康军期间,也不排斥小报。

表4 淳熙、绍熙、庆元年间,朱熹阅读小报史料统计表

序号	发信时间	史料撮要	任职情况
1	淳熙七年	《与刘德华》:小报言者有谓州官检放但忧郡计之不足…… ^{[35]第25册4828}	知南康军
2	淳熙十三年	《答詹帅书》:今见小报,新坡有请州郡上供钱上下半年比较,此其势愈急切矣。 ^{[36]第21册1200}	祠官
4	淳熙十六年	《答蔡季通》:适见小报,元善已得浙西提举…… ^{[37]第25册4692}	祠官
5	绍熙三年	《刘智夫》:小报沙世坚自请于朝…… ^{[10]第25册4862}	祠官
6	绍熙三年	《答赵尚书》:向来小报,幸是误传…… ^{[38]第21册1260}	祠官
7	庆元元年	《刘德修》:某挂冠之请,人尚未还,而小报已不允,势须再请。 ^{[17]第25册4850}	祠官
8	庆元三年正月	《茶余客话》:沈继祖请杀朱子,朱子得朝报不语。 ^{[39]201}	犯官
9	庆元三年正月末	《宋史全文》:有以小报来言者,(朱)熹略起视之…… ^{[40]2014}	犯官

二、阅读邸报新闻把握政治博弈机会

宋代新闻传播比之前代虽有极大发展,但新闻管制也随之严密,且主要目的依然是“为了禁民众的视听,以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41],不仅如此,为达成以上目的,连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平等享受新闻传受的权力。邸报是朝廷当权派的“最重要的舆论媒介”。^[42]政治博弈中一旦某党主政,他们便会利用邸报新闻维护自身、打击对手。淳熙至庆元,大多数情况下道学党在政治博弈中都处于劣势,即使在道学同调暂时掌权时,朝中敌党力量也一直存在,邸报还是无法为前者完全控制。熟悉本朝邸报成法的朱熹之所以一直坚持阅读邸报,主要在于他能够坚持独立解读新闻,并因之觅得可资利用的机会。

(一) 批判朝廷礼制建设以建构道学正统

西汉罢黜百家,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树立了正统地位,以后的王朝更迭、君主登基、维新变法等都必须在孔孟之说中寻得支持,才能获取合法性。宋代抑武崇文,有政治理想的皇帝或当权者都希望通过推行礼制、教化等方式来重现三代之世,即使平庸之辈也希望借此打造自己绍继圣学的形象。既然如此,他们就会经常利用邸报来传播兴办官学、奖励儒生、刊刻经典之类的诏令。

然而,时移世易,完全复古不切实际。皇帝或当权者倡导的所谓尧舜之道、先王之制不过是其附

会甚至曲解经典来推行今王之制、宰执之道而已。因此,夺取儒学经典的解释权在政治博弈中的重要性就特别显著。推崇礼治是儒家为政的一大典型特色。身为理学大家的朱熹,在继承以礼治国观念的同时,关于礼又有属于自己的理解,所以他格外留意邸报中与礼学相关的举措、诏令,捕捉朝廷失误或不足之处加以批判,并通过一定的渠道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以便为道学党争取更多的政治生存空间。

淳熙七年(1180),朝廷在邸报中预告了将要“编类州县臣民礼仪”下达地方的消息。对此,知南康军朱熹虽表赞同,但联想到不久前礼部下发的《政和五礼新仪》有“未详各处”,便担心新编的“州县臣民礼仪”不能尽善尽美,于是将已经颁布的礼仪制度中“不妥之处”摘录出来状报礼部,希望被朝廷认可后,再“编类成书”。^{[11]第21册930,933}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驾崩,地方不详臣民丧服礼制,一时不知所措,后有“邸吏所报朝廷冠服制度”,但在朱熹看来仍有不当之处。于是,他专门撰文,引经据典地全面指摘朝中所定丧服的“重复缪悞”,并分析错误产生之因在于有关人员企图“兼尽古今”,“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最后呼吁“当更讨论订正,别为公私通行丧服制度,颁行民间”。^{[14]第23册3347-3352}绍熙五年(1194)孝宗驾崩,朱熹再次质疑“报状”传达的臣民服孝形制,并“以书扣礼官”。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后者回复,他又与弟子通信,就此展开讨论,并指责礼官所定服制不清。^{[19]第22册2126}不久,朱熹又“见邸报”中有“台谏集议素服事”^{[18]第21册1270},便致信诤友王炎,向对方表达自己对素服制度的不同意见。纵观朱熹一生,尽管以“政事却有可观”而见知于孝宗,但仕途不显,所以闻名朝野,还是因儒家学术。史载,光宗欲“收天下人望”,需除朱熹“论撰之职,以宠名儒”,宁宗即位,授其侍讲之位,方可副“崇儒重道之意”。^{[43]第36册12756,12763-12764}甚至当时的金国人与宋使交往中,也向对方打听“朱先生安在”。^{[44]4103}名显声著,原因固多,但朱熹上述行为可成一端。

(二) 摘取新闻细节以谋求舆论合力

宋代非常重视舆论监督,台谏官之所以能与君主争是非、与宰执论短长,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进谏、陈情往往以“舆情”“物议”为论据。舆论监督为新闻媒体常见功能,宋代邸报也不例外。邸报刊载的皇帝诏旨、臣子上书中,含有的揭露、批评各级政府或官员之语,都是士大夫们异常关切的内容,蕴藏引发天下共臧否的潜能。

朱熹也十分重视此类信息,但他并非单纯的议论,而是要从中搜寻与自己主张一致的观点,打造舆论合力,向朝廷联合施压以达其政治目的。淳熙八年(1180),浙东路发生大饥荒。时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在组织赈灾的过程中发现惰政腐败、官民勾结等极为严重的吏治问题,于是多次上书奏劾有上述问题的官员,但得不到朝廷的支持。更出乎意料的是朱熹驱除庸官墨吏不成,反倒引来了他们的谣言中伤。朱熹深知浙东是宰相王淮的家乡,当地违法官吏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处理,正是因为王氏袒护所致。^{[45]477-478}于是,他以浙东荒政事为契机,与王淮党羽展开持续斗争。朱熹先是上书孝宗,假托自己任职无能,乞请朝廷将自己现任官职先行“镌削”,“逼迫”皇帝在自己与浙东违法官吏之间选边而立,^{[46]第20册777}后又致书宰相王淮,将其在浙东推行荒政遭遇所有问题,皆归因于王淮本人及其领导的朝廷——“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指之计。”^{[10]第21册1178}可是,无论孝宗还是王淮对此都无动于衷,没有丝毫回应。

正当无计可施之时,朱熹自邸报中获知:有臣僚反映浙东路衢州江山百姓缺食,知县王执中却禁止民众出境购粮。江山民为饥饿所迫,“已有夺粮之意”。圣旨批示,“有司检举闭籴指挥,申严行下”。饥民暴动、威胁统治,孝宗反应如此迅速也在情理之中。朱熹注意江山为浙东路辖区这个细节。既然臣僚揭露江山知县问题的奏疏得到皇帝认可,还录载于邸报中举国皆知,自己便可以乘机进言,向朝廷提出穷治江山知县的要求。因此,朱熹急忙上书列举了自己前次巡历衢州获知王执中的种种不称职行为,请示朝廷将其罢黜,甚至不惜再次自劾——“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并赐责罚施行”。^{[13]第21册949-950}他如此珍惜这次机会,是希望江山成为整顿浙东吏治的舆论突破口,顺

带迁出王党问题。^①只可惜,朱熹低估了王淮庇护同党的能力,亦高估了孝宗求治的决心,最后其在浙东整顿吏治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以此撼动相党的目的也没能达成。

(三) 挣脱常规内含设定以识别政治同道

“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为邸报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最为皇帝、当权者所倚重。他们认为趋利避害为人之常情,故而以上内容的传报可以实现“勉励天下之为吏者”^{[47]第7册6510}。然而,此一宣传方式,在朱熹身上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为其提供潜在同道分布的线索。

相对其他政治派别,道学党长于学术、拙于权谋,难以凭借政治势力陡然崛起以吸引众多士大夫归附,只好通过私人交往等手段逐步结交官员,引其入党。南宋时期,官员数量达数万之众。^②在古代社会,从中挑选适合发展的对象,所花成本甚巨。不仅如此,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有些党人、同道甚至亲朋经不起高官厚禄的诱惑或受不得贬官罚直的威胁,时常做出背叛出卖的举动,这样一来轻易接纳士大夫加入自己阵营也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因此,迅速壮大道学党与慎重鉴别发展对象之间遂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邸报频繁刊载官员言论或事迹,为原本没有接触的官员提供知晓彼此的机会,士大夫们可以借此判断哪些人有交往的必要。对于朱熹而言,尤其重视邸报中传布某人由于坚持与道学党相似或一致政治观点而受到惩罚的消息。因为此人的政治立场已经经过初步确认,立足之坚否亦经过了考验,故而可与之联系,日后其成为道学党的几率也颇高。如朱熹与刘光祖之间原本只是相互慕名而无深交。光宗时期,朱熹“读邸状”,获悉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因论近习被徙潼川运判,继而又得光祖所上弹劾何澹、陈贾等反道学党人的章疏,感觉刘氏之文“分别邪正,明白割切,三复惧然,为之汗下”,^{[17]第25册4845}认了其为的人,主动致信光祖,表达对其敬仰之情,并得到对方积极响应。其后,又经过多次考验,二人引彼此为知己,最后在庆元党禁中同列伪学党籍。

以朋党为中心的政治博弈,各方力量呈现此消彼长之势。一党得势,其党人就易获升迁,否则就多遭牵连。在此形势下,阵营内部分享喜悦或分担困苦,有利于朋党凝聚。朱熹对此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每当看到邸报中有道学党人遭清算的消息,他不仅停留于默默愤慨、私下谴责,还会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庆元初,朱熹“覩进奏院报”,获悉韩侂胄将昔日曾经建议朝廷另择吉地安葬孝宗的臣僚打为赵党,将其“坐罪次第降黜”后,^{[48]第21册1062}立即上疏自劾。理由是自己也曾“妄议”山陵,理应同罪同罚,以此声援同道,向控制朝廷的韩氏一党表示抗议,“不复为求全计”。^{[49]第25册4881}

(四) 刻意维持浅度解读以捕捉进言时机

多数情况下,朝廷的政策、法规先经臣僚讨论、皇帝认可后,方以诏命形式颁下,并通过邸报发布四方。在君主及执政者眼中,既然这些诏命的形成经过审慎考虑,那么就效果而言不仅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能够提高其政治声望、巩固其政治地位。因此,凡被赋予宣传功能的邸报新闻,往往包含两层信息:第一层为直白的告知性内容;第二层是寄托着宣传者所期许的暗示、象征。但第二层信息的传达成功,需要新闻接受者主动配合,调动其信息解读能力。否则,新闻传播就只能发挥告知性功能而已。朱熹对这些邸报新闻的解读,有时则刻意停留在表层信息,并加以利用,以此实现其政治意图。

淳熙七年(1180),孝宗因久旱无雨而下诏,许“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悉以上闻,无有所隐”,^{[50]第20册581}并通过邸报向天下通报。天人感应观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上天能够感应人间政事,并对应降下祥瑞、灾祸以示鼓励或警戒。因此,每逢重大灾害或异常天象出现,皇帝通常会下求言诏,向各级官员、百姓征询意见,以改进朝政,使上天欢愉收回灾异。然而,实际上没有几个皇帝或执掌朝政的官员能够真正做到从谏如流。但是,一旦求言诏降下,臣僚亦需积极配合,在应诏奏疏中议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便于皇帝或执政者收场。因灾异而下诏求言更像是依

^①此意图由朱熹致书王淮的文字和日后连续六上章表弹劾王淮姻亲、前台州知州唐仲友推知。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二载,乾道年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合四选凡三万三千一十六员。《宋史》本纪第四十四理宗四载,宋理宗统治时期,官者总数达二万四千员。

照传统进行的“娱神”仪式。作为学者型士大夫,朱熹虽然对求言诏发布的目的和作用了然于胸,但他还是应诏上书,尖锐地批评孝宗任免官员罔顾“公议”,一味重用“近习之臣”,提出朝廷欲一新政事,皇帝首先应做到“心术公平”,亲近“贤臣”,远离“小人”。^{[50]第20册584,586}与此同时,朱熹写信给侍御史黄洽,鼓动其履行监察之责,与自己并力论奏近臣惑主弄权,事或未成,但二人前仆后继的上书,“必有闻风而兴起者”在后,从而营造“直言日闻”之场面。輿情一起,皇帝“终必感寤”。^{[51]第21册1147}

道学党对近习党把持朝政早就心生不满,屡次发起弹劾行动,虽偶有成功,却多以同党丢官罢职为代价,难以扭转大局。朱熹自视人微言轻,又有前车之鉴,只能选择暂时噤言蛰伏。此次打破沉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皇帝下诏求言,为打消进言者顾虑、彰显帝王胸襟,在诏书往往有“虽有过差,必无罪谴”“弗协于理,罪不汝加”^{[47]第1册204,208}一类的承诺。而且,求言诏已经由邸报播告天下,一旦有人直言获咎,“朝廷乃因是而致谤”。^{[43]第36册12490}因此,多数情况下,皇帝或执政者会对进言者加以适度包容。“绝佳”进言时机就此形成。果然,朱熹应诏奏疏中的犀利观点、直白表达激起孝宗大怒,他指示宰相赵雄责令朱熹做出解释。尽管赵雄正是奏疏中所指斥的“小人”,但他还是劝说皇帝宽恕朱熹,理由为“若罪之则适成其名,不如天覆海涵,置之不问”。^{[52]第324册322}其潜台词是:求言诏已经由邸报昭告四方,若加以罪责,则陷皇帝、宰执失信于天下,反使輿论导向朱熹或道学党。因此,尽管朱熹进言失败,但仍能保全自身。

三、借小报新闻洞悉形势抉择进退

执政者重视邸报管制,因为政治消息刊载得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官场輿论的稳定、本派系的政治形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定本制度施行期间,执政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对邸报内容依据本派系利益标准进行取舍,即使定本废止期间,他们也可用曲解相关法规或通过向监管衙署安插亲信等方式,实现上述目的。^[53]频繁的干涉,造成邸报刊载的内容有限、传布迟滞。小报属于民间出版物,不像邸报生产、发行环节那样须遵守繁复的管理程序,内容更丰富、传递更快捷,对读者身份也无要求,深受官员、布衣之士的欢迎。身为道学之士又卷入政治博弈的朱熹,小报对其政治生活的意义,当然不能等同于对一般读者的意义。他利用接受小报新闻,实现突破皇帝与执政者设置的信息藩篱,直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一) 旁采异论孕育对抗性輿论

如果朝廷针对某一建议或事件,尚无一致意见形成,通常禁止邸报传播,以免引起輿论分裂、人心不安。为此,中央有司还制定了专门法规,即所谓“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传报者以违制论。”^{[47]第7册6535}如绍熙年间,孝宗、光宗父子失和,光宗拒不向父亲问安。朝臣多次上书切谏,光宗却置之不理。在以孝治天下的宋代,若臣民得知皇帝如此悖逆,会忧心纲常倾覆。掌朝宰执们不希望将此消息扩散出去,四方官员因而无缘于“邸报”见到有人进谏“定省”一事。^{[15]第25册4647}

小报不受官方控制,可刊载此类文字,使被皇帝、执政大臣压制的异论得以为天下所知。淳熙六年(1179),江南东路一带爆发旱灾,朝廷却不肯拨款用于赈济。知南康军朱熹在致刘允迪的信中,转述自己观看“小报”,发现有“言者”抨击“州官检放但忧郡计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并补充道“闻圣心极焦劳,但无如有司出内之吝耳。”^{[35]第25册4828}由此可见,“言者”的观点似未获皇帝或执政者的认可,否则“有司”不会如此吝惜。是故,此消息实为小报漏泄的朝廷政事。然而,“言者”所论在朱熹这里获得认同,评价其观点为“平论”。^{[35]第25册4828}淳熙十三年(1186)前后,朱熹观小报刊载“新坡有请州郡上供钱上下半年比较”,判定其为苛政。一贯倡导体恤民氓的朱熹,在私书中发出“当路之人,略无忠言奇策以开广德意,而所以椽丧邦本者日甚一日,为之奈何?”^{[36]第21册1200}的感慨。由上述事例可以推知,被朝廷“雪藏”的政治主张一旦经小报扩散开来,为如朱熹之流所接受,再经书信等渠道的流传发酵,便有发展成对抗性輿论的潜能。

(二) 窥见密政规避政治风险

面对惨烈的党祸,宋代有些士大夫暂时放弃刚直的处世之道。然而,出于维护稳定或本党利益等考虑,执政者经常禁止邸报传报“敏感”领域的奏疏政令,这样就造成官员们对一些政策出台缺少完整认知,无法全面准确了解朝政现状,也就无从判断“天命”是否佑我。朱熹曾因此而发出“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54]第17册2844}的感叹。每当此时,小报的突破报禁,录载的朝政新闻就显得尤为重要。绍熙三年(1192),小报载,负责镇抚叛乱的广西路副总管沙世坚请求朝廷拨发一定数量的僧牒以为激劝犒劳之用,已经获得批准。朝廷为了维持政局稳定,除了捷报之外,一般禁止邸报刊载平叛、对外战争演进过程的消息。对于以祠官身份家居的朱熹而言,只能通过小报获悉沙世坚请求僧牒一事。绍熙三年十二月,朝廷任命朱熹为静江府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由于朱熹事先透过自请僧牒以治边一事,知悉边帅、朝廷在平叛过程中坚持的原则与己所持舛驰,明言胸中所疑——“如此则帅复安用?”在卷入政治博弈的背景下,他担心“此等事若整顿着便成痕迹”,只能拒绝接受任命。^{[10]第25册4862}

四、对报刊传播结构性缺陷的认识

邸报作为官报,所载新闻具有权威性,只是由于皇帝、执政者过度干涉,造成其内容有限、传报迟滞等弊端。小报则摆脱政府羁绊,使士大夫等群体能够较快地获得邸报所不载的朝政新闻。这种官私报刊的互补组合看似完美,实则存在很大的缺陷。这种缺陷,对身处政治漩涡中的朱熹而言,造成的不适体验尤为强烈。

(一) 官私互补难以解决新闻供给困境

邸报由于受到管制,有些朝政信息无法发布,相对自由的小报则能补其不足。然而,小报时盛时衰,生存发展极不稳定。若朝廷管理松懈,内探、衙探、省探之流探听活跃,小报则远近流布;若朝廷加强门禁、重置典宪,则小报便呈衰竭之势。结果出现邸报不报的新闻,“但小报批下”,“或禁小报,则无由可知”^{[55]855}的局面,士大夫们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弥补邸报新闻之缺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观邸报,看到“编类奏札一事”,既不知“出于何人”,又不知是否有意为之,“恐有深意”。小报又不报。为了释疑,他拜托最近到都城的学生一旦听到相关消息,“子细喻及。”^{[10]第25册4859}同年,朱熹获知朝中两名谏官去职,但具体原因不详,只能依靠在京任职的学生詹体仁打探,嘱咐其“子细报及。”^{[56]第21册1225}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被弹劾罢相,这在政坛是一件大事。然而,弹章具体内容如何,邸报无载、小报不传,朱熹只好凭借搜集“风语”获知一二。^{[57]第21册1275}另外,小报的采编者多为下级官员及胥吏之辈,其素质难以理解文化教育等新闻的重要性,对该类新闻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暗示也很难把握。在现实中,官场中的大多数还是热衷于人事变动、皇室生活、国内战事、边境冲突等新闻,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小报经营者当然要顺应购买群体的需求。^{[58]105}因此,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尚未发现朱熹通过小报接收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礼乐、舆服、仪制、经学等方面的新闻。采编者的素质和经营者销售活动的目标定位,决定了小报内容有着与生俱来的残缺性。

(二) 小报的非法性限制其政治反馈功能

小报的非法身份,使得士大夫无法直接以其为信源向朝廷进行政治反馈。但是,小报传布的“政治新闻”,再经民间广泛传播、“百姓的议论”,可以有机会变成谏官手中向皇帝、执政者施压的“舆论工具”。^[59]然而,为了打击小报发行,朝廷颁布了专门的法令,不仅参与小报生产的人员要受到处罚,“所受小报官吏”也要“取旨施行”。^{[47]第7册6557}置身复杂政治博弈场中的士大夫也不敢公开传播、讨论小报的内容。是故,朱熹既无法因小报传报的新闻而上章,也轻易不敢因小报传递的消息而大张旗鼓地发动舆论,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在熟人中交流信息。表4中涉及朱熹与之进行小报信息交流者,不为同道即为弟子:刘允迪(字德华),淳熙六年至八年结识朱熹而从游,其后二人交往颇深。詹仪之(即詹帅),好理学,乾道七年(1171)即邀朱熹讲学,日后交往甚密。蔡元定(字季通),绍兴二十九年(1159)拜师朱熹,有“朱门领袖”之誉,日后名列伪党之中。刘崇之(字智夫),淳熙二年(1175)中进

士前,曾受业于朱熹。赵汝愚(即赵尚书),道学同调,淳熙十年(1183)曾与到访的朱熹交友、多有唱和,日后列伪党之首。刘光祖(字德修),道学同调。围绕同一问题、现象,参与信息传播和评论的主体愈多、范围愈广,成为舆论的可能性愈高,可是小报的非法性显然限制了讨论主体的数量与范围,最终限制了舆论和政治反馈的形成。

(三)小报误传增加政治焦虑

小报多为下级官员与胥吏之辈借用职务之便,得公文之漏或采人口之谣编纂而成,内容准确性大打折扣,使得读者无法据其形成确定无疑的认知、判断,由此生发出来的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行动筹划等价值大受影响,甚至还可能对读者的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困扰。绍熙三年(1192),朱熹萌生隐退之意。在此期间,却有小报“误传”朝廷有新的任命。在朱熹“与世相忘”之志已定的情况下,这则虚假消息给他造成“又费分疎,愈增罪累”^{[38]第21册1260}的焦虑。上述信息与朱熹生活的贴近性很强,重要性相对较弱,若是重要性较强的虚假新闻,造成困扰会更大。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御史沈继祖以六大罪状弹劾朱熹,言其罪浮于少正卯,亟诛之亦不为过,请朝廷将其处以褫职罢祠的“薄惩”。朝廷奉圣旨依沈氏所请^{[44]4145}。不久之后,只是涉及沈继祖弹章中申请诛杀朱熹内容的“朝报”先于省札传至朱熹手中。^①史料记载,朱熹阅后,先是沉默地散行庭中,既而自言:“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转而又云:“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39]201}此类不确新闻先于邸报到来,对当事人提前进行行动调整或选择并无实质性帮助,反倒徒增心理负担。

五、制度惯性下的破局思维与舆论抗争的失败

在政治博弈中夺取胜利或巩固胜利成果的有效方式是根据朋党利益而出台或革新制度。既有使用邸报、小报参与政治博弈的实践,又饱尝新闻控制之苦的朱熹,仕宦生涯中并未对改进邸报与小报管理制度做出丝毫努力。尤其淳熙末至绍熙,亲道学党或道学党人执政,朱熹有充分机会就朝廷法规政策建言献策,他依旧选择沉默。

将内圣外王作为人生追求的朱熹,不同于一般朋党领袖。他心中有革新政治的理想,其中针对中央权力布局与运行部分为:中央主要权力划分为君主、宰相与台谏三大领域,并且其日常运行必须依据“公共商讨”与“士林舆论”。具体而言,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宰相与台谏群体内部、三大权力领域之间要坚持“公共商讨”。同时,上述主体在发挥各自政治职能的过程中要积极获取士大夫群体的“公论”作为决策依据。^[60]选任官吏等日常事务,“须求之公议”,^{[54]第17册3503}行变法等大事,“若不兼采众论,熟加考究”,则未来容易“弊病百出”^{[61]第20册824-825}。在难以掌握充分信息又需要短期内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依据“物论”判断是非是最好的选择。^②可是,小人欲惑主上、误导士大夫,往往将“出于此曹之私意”的主张,“皆托于士大夫之公论”。^{[54]第17册3487}另外,依据当时的政治状况一味广采公论还会造成政事拥滞徘徊。朱熹知漳州期间,向中央建议推行经界法,然而朝廷“异议纷纭,久而不决”,^{[62]第21册965}经界一事尚且如此,“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众”“使更有大于此者,将若之何?”^{[54]第17册3477}循此逻辑,无论对邸报或小报传报内容、形式进行怎样的改进,只要小人在朝、决策者的素质不高,都无助于“公共商讨”“公论”(士林舆论)发挥作用。

天下事有本末之分,“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63]第21册1084}是故,上述问题的解决,“进君子,退小人”才是“第一义。”^{[54]第14册461}君子与小人区别在于君子“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何”,小人“则只计较利害”。^{[54]第15册1004}讲求天理是道学党的一贯标榜,“进君子”就等同于引进道学党人,“退小人”等同于清退反道学的士大夫。同时,既然明确道学党就是君子之党,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引其君以为党”。^{[64]第21册1244}君臣上下一体后的朝政输出,“顺天理、合人心”,则生“天下万口一辞之公论”,从根本上杜绝小人“异论”滋生的

^①此处朝报应为小报之异称,因为邸报不可能断章取义地记载弹章,更不可能只录弹章而省去皇帝诏令,引发读者的猜疑。

^②朱熹知漳州期间,改造州学,以“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贤否,风俗厚薄”,“所以采访乡评物论,延请黄知录,以其有恬退之节,欲得表率诸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六))

温床。^{[63]第21册1086-1087}

按朱熹的逻辑,如果道学党掌握政权以后,决策者、监察者在道德、智慧层面上皆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决定政治信息被传播与否都出于“公心”,因此是符合“天理”的。绍熙至庆元初,宰执中的留正、胡晋臣、赵汝愚、余端礼等,尽管尚未达到朱熹心目中尽善尽美的君子境界,但也是其认可的“诸贤”。^{[15]第25册4647}因此,他们掌控邸报传播内容,甚至重启一度被废止的定本制度,^①朱熹才未发一言。

为减少政策失误,宋代朝廷出令有一套把关程序,“给事中”一职的设置就是最后审定环节。皇帝旨意只有通过“给事中”审核后才能形成诏令颁布。朱熹认为:“在内给事”,凡朝廷差除失误,在出令之前就整顿了,避免将其“宣露于外”。小报往往提前传报,以至于“远近皆知了”,给事中变成了“给事外”,“这般所在,都没理会。”^{[54]第18册4003}以此推之,在朱熹眼中小报传播不仅多余,而且易致扰乱中外人心之祸。绍熙至庆元初,被道学党认可的“贤臣”在朝,“外间事赖诸贤维持,且尔无大疏失”。^{[15]第25册4647}因此,淳熙十五年(1188),宰相周必大亲自撰写扼杀小报的御笔,^{[65]第3册1442}淳熙四年(1193),朝廷针对小报传授者制定更为严厉的处罚命令时,^{[47]第7册6558}朱熹亦未进行劝阻。^②

可见,在朱熹的政治改革蓝图中,报刊并未被纳入考量范围。在他心目中,邸报不具独立性,于政治运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掌控者的品德之善恶,至于小报更是制度纰漏的产物。朱熹对现行报刊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他的不满仅仅在于新闻宣传权操于他人之手。

在政治形势对朱熹及道学党有利的情况下,邸报、小报的生存和运行环境没有任何改善。当韩侂胄及其党羽依仗宁宗的充分信任,将道学党打为伪学党、逆党,并展开残酷迫害时,朱熹也无法利用报刊作为抗争武器。“庆元党禁”期间,尽管朱熹仍坚持阅读邸报,但独立解读新闻、寻机反抗的行为却越来越少。特别是庆元三年(1197)末,党禁进入高潮后,他阅报后所表现出的更多是恐惧之下的谨言慎行。在写给刘光祖的信中,朱熹言道:“间读邸报,幸复联名,而贱迹区区乃先众贤,为不称耳。侧听久之,未有行遣,势不能免,姑静以俟之耳。度君周卿来访,志趣不凡。知尝出入门墙,固应如此。虽已不敢隐其固陋,然磨磐浸润之功,尚不能无望于终教之也。”^{[17]第25册4852}“幸复联名”之语表现其幽默、乐观,“度君周卿来访”云云更让人误以为他对“逆党”之事的不屑一顾,稍一提及便立即轻松地转谈他事,然而“侧听久之,未有行遣,势不能免,姑静以俟之耳”一句,已暴露出其表面洒脱达观之下实为放弃抵抗、听人摆布的真实心态。随着“逆党”之网愈收愈紧,他连表面的洒脱达观都做不到了。庆元五年(1199),当学生庆祝他致仕成功,朱熹却答以“然阅邸报,犹未免有旁及之词,只恐诸贤更欲子细看详,未肯放过来哲手中也”^{[27]第25册4728},再无当年主动上书自劾的勇气,却有唯恐党祸再来之忧虑。当他通过邸报得知刘光祖以附和伪学被斥房州居住,“为之怅然,寝食俱废”,悲凉地发出“吾道之穷,一至于此。”^{[26]第25册4761}已经由对个人际遇的忧虑上升到对道学命运的担心。随着邸报传至的不利消息越来越多,其心态的改变最终影响到行动。朱熹从原来的进则入仕为官、以理立国,退则为文著书、弘扬道学,逐渐转变为“是以年来绝不为人作一字,近所祈恳,百拜而辞者已数家矣。”^{[24]第23册2885}即便朱熹偶尔“阅邸状”,获悉当年迫害自己最为积极的一些官员相继被罢官,初时感到“时论似寢平”,但很快又担心“主人意不坚牢,或有反覆,即其祸愈甚耳。”^{[25]第22册2494}他既不敢放言议政,也不敢抓住时机上书自白。^③而且,就目前留下的史料,基本上不见其庆元三年以后的小报接收行为。可能的原因,除了接收小报确有违法之嫌外,或许是不想在形势不利的特殊时期徒增谣言带来的困扰。朱熹的上述表现,虽然根本原因在于韩党的政治打压,但韩党操纵下的新闻垄断,也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载,绍熙四年(1193),“朝报逐日自有门下后省定本,经由宰执,(进奏院)始可报行。”

^②在此期间,朱熹仍然接受小报或小报信息。可能是因为朱熹看来,留正、周必大等人都不是道学之士,朝堂还未实现完全为君子掌控,距离理想中的朝堂还有一定差距。

^③此时的朱熹已经处于年老多病、致仕家居的状态,他当然没有个人的仕进要求,但是如果政治空气允许,他还是可以呼吁为自己昭雪,为道学平反。

六、结论与讨论

尽管发达的科举制为宋代出身寒微者加入统治集团创造了机会,但他们与血缘继承制下的权力阶层(皇帝为首的皇族和荫补官员等)相比,仍缺乏抗衡的力量。因此,士大夫们“以‘公天下’这样的儒家理想来实践自身的政治发言权”,“获得了公共主体的代言资格”,促使两宋呈现出比之前代“言论清明”的格局。^[66]不过,朋党政治带来的政治博弈却使这一局面很难维持。因私利而团聚是朋党的基本特征,这一点决定由其而生的政治博弈不能以合法面目示人,绝大多数手段都是谋于密室、施之诡计。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朋党不可能将媒介打造成全面录载新闻、反映政治舆论的工具。因此,身为道学党人的朱熹放弃对邸报、小报管理制度革新之念也是很自然的选择。这正与前人总结的朋党“议论多而成功少,工于措词,拙于实践,勇于争论,怯于履行”^{[67]239}的特征相符。以后元明清各朝朋党,其性质大体与本文所讨论的南宋情况类似,由其制造的政治博弈同样难以推进报刊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报刊成为舆论监督的工具、人民之喉舌,必须等到真正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现代政党领导新闻传播事业以后。

斯图亚特·霍尔根据受众对含有意识形态的媒介内容解码方式的不同,归纳出主导—霸权、协调、对抗三种类型。^{[68]356-358}朱熹对邸报新闻的解读也能与之对应,但是其中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皇帝因天灾而发布求言诏,追求的只是形式而不在意结果,这在当时是基本的政治常识。朱熹有意停留在新闻意蕴的表层进行解读,也加入应诏言事者的行列,可是又真的在上书中揭露朝廷弊政,实际是一种伪装成主导—霸权式解码的对抗式解码。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对求言诏持相似解读的估计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的应诏上书确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这就启发我们,就政治信息接受者真实的解码而言,能够划分为三种类型,但是从受众的外在表现来说,却要考虑增加伪装主导—霸权式解码、伪装协调式解码、伪装对抗式解码。伪装解码极具迷惑性,给政治传播效果评判提升了鉴别的难度。

参考文献:

- [1] 罗家祥.论北宋党争的起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6):82-88.
- [2]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 [3] 田建平.《邸报》内容与宋代国政——哲宗时期李焘笔下的《邸报》记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12.
- [4] 刘大明.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 [5] 王润泽.中国新闻传播价值理念的历史特质(一)——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业的价值取向.新闻与写作,2014(2):67-70.
- [6] 魏海岩.中国最早的新闻月刊——进奏院月报.国际新闻界,2012(2):97-101.
- [7] 郭志菊.版印媒介技术背景下宋代的书禁与报禁政策研究.新闻大学,2021(2):16-27.
- [8] 魏琨.宋代小报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700-705.
- [9] 庆振轩.两宋党争起因散论//庆振轩.两宋党争与文学研究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5.
- [10] 朱熹.刘智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1] 朱熹.乞增修礼书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2] 朱熹.缴进奏疏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3] 朱熹.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4] 朱熹.君臣服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5] 朱熹.答黄直卿//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6] 朱熹.答王子合//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7] 朱熹. 刘德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8] 朱熹. 与临江王倅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19] 朱熹. 答黄商伯//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0] 朱熹. 乞追还待制职名并自劾不合妄议永阜殯陵事奏状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1] 朱熹. 与黄知府//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2] 朱熹. 与饶廷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3] 朱熹. 与宰执劄子//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4] 朱熹. 答折子明//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5] 朱熹. 答刘季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6] 朱熹. 答刘德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7] 朱熹. 答刘晦伯//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28]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30//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9]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36//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0]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59//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1] 吕祖谦. 与朱侍讲元晦书;63//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2] 陆九渊. 与朱元晦书;2//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3] 王炎. 与朱侍讲晦翁论谅暗中开讲事//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4] 杨万里. 答朱侍讲元晦//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5] 朱熹. 与刘德华//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36] 朱熹. 答詹帅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37] 朱熹. 答蔡季通//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38] 朱熹. 答赵尚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39] 阮葵生. 茶余客话. 李保民,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40] 佚名. 宋史全文. 李之亮,校点.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41] 李四明. 邸报制度与宋代新闻管制邸报制度. 新闻爱好者,2009(16):68-69.
- [42] 展龙. 舆论史:中国历史场景中的公众意见与政治秩序.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73-81.
- [43] 脱脱,等. 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4] 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45] 束景南. 朱子大传.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 [46] 朱熹. 乞赐镌削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47] 徐松. 宋会要辑稿.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48] 朱熹. 乞追还待制职名并自劾不合妄议永阜殯陵事奏状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49] 朱熹. 程允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50] 朱熹. 庚子应诏封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51] 朱熹. 与台端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52] 王迈. 跋陈君保作喆藏赵忠定公帖;2//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53] 魏海岩,韩立新,陈建群. 皇权和相权争夺中的信息控制:宋代邸报定本模式演变考.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8):95-109.
- [54] 黎靖德. 朱子语类//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55] 洪迈. 近世文物之殊//洪迈. 容斋随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56] 朱熹. 与张元善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版,2002.
- [57] 朱熹. 答李季章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58]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59] 姜华. 古代中国舆论的发生及其内在精神.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9-77.
- [60] 苏鹏辉. 试论朱子经世思想中的“公论”观念. 政治思想史,2015(3):47-56.
- [61] 朱熹. 奏议役利害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62] 朱熹. 回申转运司乞候冬季打量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63] 朱熹. 与陈侍郎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64] 朱熹. 与留丞相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 [65] 周必大. 禁小报御笔//周必大. 周必大全集. 王蓉贵,白井顺,点校.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66] 赵云泽,董翊宸. 宋代士人阶层重组与言论清明格局的形成. 新闻大学,2019(5):30-43.
- [67] 王桐龄. 中国历代党争史.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 [68] 霍尔. 编码,解码. 王广州,译. 罗钢,校//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Limited Information Games under Institutional Inertia: Zhu Xi's Political Strategies and Media Practices in the Song Dynasty

Wei Haiyan(Hebe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leading figure of the Daoxue fac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u Xi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formation conveyed through official newspaper “Dibao” and unofficial newspaper “Xiaobao” in political contestation. He strategically mobilized such information to enhance the prestige of Daoxue learning, identify political allies, attack rivals, and mitigate political risks. In doing so, Zhu Xi demonstrated a keen awareness of several structural problems embedded in the contemporary news circul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chronic insufficiency of official news supply, the legal marginalization of unofficial newsletters that constrained political feedback, and the political anxiety generated by misinformation and rumor transmission. However, constrained by the prevail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his own political positioning, Zhu Xi was unable to advance substantive reforms of the media system. His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s a reader and user of news media reveal that, under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an autocratic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political maneuvering alone could not serve a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news communication in premodern China.

Key words: Zhu Xi; Dibao; Xiaobao; The Song Dynasty; political strategy

■收稿日期:2025-08-22

■作者单位:魏海岩,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责任编辑:肖劲草